

历史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与政治因素，但是人类历史进程宏观的方方面面都与经济政治共进，其根本是人类的思维的宏观现象。

Thomas Kuhn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理论由此可以推广。

西方社会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完备化的思潮中。在这一时期许多“最终解决方案”被提出，典型的如 Russell 与 Whitehead 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9 世纪末对“物理学大厦已经建成”的说法。这种思维暂且称之为完备主义。

完备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雏形。这并不是说完备主义存在某种罪恶，而是其客观上与帝国主义的思维存在大的相似性。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与学术齐头并进，在世纪之交达到高峰，即完备主义，其在政治上体现为帝国主义。

完备主义在诞生时就注定其命运，因为“完备”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物理学的完备主义在 20 世纪初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研究崩塌，数学的完备主义则同样在 20 世纪初数理逻辑的研究中崩塌，政治的完备主义的崩塌过程自然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冷战，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愈来愈淡化。

这样的崩塌过程自然的引发新一轮的革命。学术的大厦遭到了重构，政治的格局亦经历了重塑。这树立了新时代的“联合国”价值观，联合国主义正是完备主义重塑的产物。

完备本身是追求确定的，但是其又必然是不确定的。完备主义的革命在新时代中产生了怀疑的矛盾的，不可知的迷茫的情结。这一情结贯穿了 20 世纪后期一系列的怀疑与疯狂，而且更加的在 21 世纪信息结构的推波助澜下增广。